

论“邛都夷”社会发展 与南方丝绸之路的关系¹

龚伟

【摘要】“西南夷”社会发展进程受先进文化国家进程的影响，战国时期的古蜀开明王朝及秦、西汉都对“西南夷”不断的推行国家化管理。“邛都夷”在西南夷中具有独特区位，在地理交通方面都有典型特点。“邛都夷”社会发展与南方丝绸之路的关系密切，南丝路在交通、贸易、文化交流和族群关系等方面有着重要的纽带作用。“邛都夷”向国家郡县制管理进程迈进的历程中，南丝路起到不可替代作用。

【关键词】邛都夷；社会发展；郡县制度；南方丝绸之路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7)09-0070-7

“邛都夷”是秦汉时期“西南夷”²中的一支重要族群，西汉时期司马相如和张骞两次出使西南夷，在西南夷逐渐设置了郡县，可称为“初郡”。西汉之前，秦国灭巴蜀，也在“西南夷”设置过郡县，如载：“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於南夷。”³可见“西南夷”地区纳入国家郡县制度早至战国时期，在战国之前“西南夷”社会的组织状态还远未达到国家的模式，是受古蜀的控制和管理。“邛都夷”社会在西汉时期当时农耕定居的社会，其社会组织如段渝新近研究认为是复杂酋邦社会形态。见诸文献所载，如“邛君”“粤西蛮夷任贵亦杀太守枚根，自立为邛谷王。会莽败汉兴，诛贵，复旧号云。“可知“邛都夷”原初社会的状态在西汉以后还有一定程度的延续。

战国至西汉时期是“邛都夷”社会向郡县制度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历来被史家认为是“西南夷”社会发展最剧烈时期⁴。这一时期的“西南社会转型发展，即秦、汉政权在这一地区逐渐设之郡县制度，也可以看作是“西南夷”社会跨越式迈向国家化进程。学者认为在汉文化强劲影响下，“西南夷”自身文明演进进程被打断，成为中国文明重要的亚文明区之一⁽¹⁾。这层关系昭示着“西南夷”虽作为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和文化区，其社会发展仍与中原王朝的国家进程息息相关。学者认为当一个地区较早进入到成熟国家时期，其拥有对这一地区的“合法化”权力，并利用这种权力对司边地区产生重要影响。也就是先进国家对后进文化人群发展的路向有改变作用⁵。“西南夷”是处在中国早期国家发展中的边缘地区，文化上粗显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 2015 年一般项目：“南方丝绸之路与中国文明对外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5BZS017）。

作者简介：龚伟，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44。

²关于“西南夷”本文主要是指《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言“西南夷”，指的是不包含巴蜀在内的“西南夷”族群及其区域。按照学人的解释，“西南夷”一词概念在先秦至汉晋时期有几次变化，大致如秦灭巴蜀前的“西南夷”包含巴蜀，秦灭巴蜀后至西汉的“西南夷”指“巴蜀西南外蛮夷”。

³《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⁴这一时期的概述，段渝先生《四川通史》先秦卷认为是“从巴蜀之巴蜀转向中国之巴蜀”的转变时期，见第 456-460 页；黎小龙、张渝《试论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开发进程中历史阶段的划分》认为是“中国西南第一次大规模开发的特殊时期”，见《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3 期。

⁵中国早期国家研究中一些概念问题的理解及应用，谢维扬先生著文专门探讨过，参考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研究中一些概念意义的理解问题》（《中原文化研究》2013 年第 4 期）。

落后，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邻近的古蜀及中原王朝影响。这层关系，可借用谢维扬先生对中国国家进程多元化中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的阐述：“中原帝国或国家以殖民模式或浅层控制模式，将蛮夷制度扩布到更广泛地区”，“迄至汉朝，中国境内的国家化进程主要还是以中原汉族王朝运用武力……使之纳入到中原国家的进程范围”。^[2]

“西南夷”地区的国家化进程本应指“西南夷社会自身的国家化发展。关于这一层涵义的研究，段渝先生新著对于“西南夷”文明自身发展道路做了详尽而又丰富的论述，落实到本文具体讨论的“邛都夷”其自商代中期至战国前期已经步入复杂酋邦社会^[3]。一般而言，“西南夷”独自国家化进程没有最终完成，受到古蜀及秦、汉的强力干预，到秦灭蜀后“西南夷”渐被纳入到中原国家化进程范围。实际上“西南夷”国家化进程早可追溯至古蜀时期。降至战国晚期，先进国家政权在整个“西南夷”地区开启了新一轮的国家化进程。至秦汉时期，国家政权在“西南夷”推行“大一统”的政策，其表现之一即设立边郡制度，将边缘地区纳入国家政权的控制范围。“邛都夷”社会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如何实现向郡县制过渡？实与历史时期的南方丝绸之路关系密切，这是本文主要的叙述内容。

一、南丝路交通体系与“邛都夷”区位

先秦时期西南地区的交通体系主要指“南方丝绸之路”(下文称“南丝路”)，南丝路是从古蜀经“西南夷”通往滇、缅、印诸地的古代商贸交通线路。按照《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述，“南丝路”实际上有两条。一是“西夷道”，从成都经雅安(临邛)、荣经(严道)、汉源、越西至西昌、云南。二是“南夷道”，从成都南下乐山、宜宾(犍道)沿五尺道人滇(入滇后分两路，一路南下经红河入中南半岛，一路西向与西夷道相汇一道抵达缅、印)；或沿五尺道经黔西北，南下黔中、由牂牁江入南越。

晚近学术界将“南方丝绸之路”的走向划分为东、中、西三条干线，东线就是文献所载的“南夷道”入南越一线(沿五尺道人牂牁江，可前往黔中、南越)；中线就是文献所载“南夷道”入滇一线(沿五尺道人滇后，渡红河进入中南半岛)；西线就是文献所载的“西夷道”入缅、印一线。^[4]南丝路的年代最早可追溯至商代中晚期，如段渝先生撰文系统地将三星堆文明中的青铜器物、海贝、象牙等文化集结与南亚、中亚文明梳理比较，指出在商代古蜀便与南亚和近东文明存在密切的交流^[5]。商代中期以降，南丝路便一直起着沟通西南地区不同族群间互相交流、贸易的作用。

自三星堆文化二期到秦灭巴蜀时，古蜀国历经鱼凫时期、杜宇时期、开明时期，这是古蜀的早期国家时期。古蜀早期国家与中原早期国家之间联系不断，古蜀国对“西南夷”地区的控制和管理也代有承袭。降至战国晚期、秦汉之际，古蜀王国被并入秦王朝，古蜀与“西南夷”被纳入到新的大一统国家政权中。“西南夷”还要适应从古蜀王国管理区转变为大一统国家政权的边缘区。秦汉国家政权开始在“西南夷”推行国家化管理的边郡制度。使原本复杂的“西南夷”关系愈加复杂，有的能够与国家政权很好的融合，有的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顽强的抵制策略。这也就是司马相如所说的“流风犹微”现象：

(而)夷狄殊俗之国，辽绝异党之地，舟舆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风犹微。内之则犯义侵礼於边境，外之则邪行横作，放杀其上。^[6]

这里的“辽绝异党之地，舟舆不通，人迹罕至”反映汉政权与“西南夷”的交通阻隔艰险，影响到“西南夷”边郡的治理。

“邛都夷”在“西南夷”中的区位显得特殊，大致“邛都夷”处于蜀与“西夷”“南夷”的过渡地带，“邛都夷”以西为“西夷”诸族，自“邛都夷”而南可通“滇”。由此可见，南方丝绸之路的交通体系中，

“邛都夷”处于“西夷道”必经路段，且自“邛都夷”往东可通“焚道”，从而形成南方丝绸之路重要的一条东西向支线。“邛都夷”是“西南夷”中较早加入边郡制体系，完成跳跃式迈入国家郡县制管理。可知“邛都夷”在“西南夷”中具有特殊区位，以“邛都夷”为主体考察其迈入国家郡县制管理的进程及其特点，有助于深入理解同期“西南夷”转向郡县体系的历史过程。

二、“邛都夷”社会跨越发展中交通要素

(一) “邛都夷”与南方丝绸之路的关系南丝是蜀郡通往域外的重要交通贸易路线，其“西夷道”就是从古蜀南下至邛都（西昌）继而至滇，也可西至笮、昆明。“邛都夷”是南丝路西线的重要枢纽中心，“邛都夷”对南丝路的开通和维持主要有如下三点突出贡献：

1. “邛都夷”为（对）南丝路开通与维持提供必备的人力资源。如有学者认为，“西南夷”既是南丝路最初的开辟者也是主要的受益者。^[7]根据大石墓考古反映的历史情况，可知早在战国时期，邓人就已经在安宁河河谷地区形成聚邑中心。而蜀郡通往“邛都夷”的“西夷道”（或称“旄牛道”）的交通道路更已通达。《华阳国志·蜀志》记载：

严道县，……秦开邓来道，置邮传，属临邛。^[8]

临邛县，本有邓民。秦始皇徙上郡民实之。^[9]

由此可见，战国时期临邛、严道之间的交通状况已十分发达。秦灭蜀后，秦在“西南夷”施行“开邛来道，置邮传”。至于文献所言“开邛来道”应指从蜀郡越“邛来山”抵达“邛都夷”“笮都”的交通路线。对此，《华阳国志·佚文》说：

（严道县）道至险，有长岭、若栋、八渡之难，杨母阁之峻。……邛来山本名邛笮……山岩阻峻，回曲九折，乃至山上。^[10]对这则史料，任乃强先生据《水经注》增补为“道通邛笮，至险……”^[11]若任氏不误，则“邛、笮”之间虽有天然的交通屏障，但两族群之间仍交流互动不断。以上史实说明早在秦灭巴蜀之前，“邛民”就早已形成一个适宜自己的交通网络。

2. “邛都夷”有丰富的物产资源，为南丝路贸易作积极的贡献。贸易交流是南丝路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风格而言，安宁河河谷大石墓考古出土许多小件饰品（西郊 M1、轱辘桥 M1、阿荣 M3 等）与盐源盆地小件饰品（老龙头墓地 M6、M11）相似。两地墓葬中都出土绿松石珠、玛瑙珠，和滇文化区考古出土的琉璃珠、绿松石珠（江川李家山 M22、M24，晋宁石寨山 M7、M13 等）相似。对此，张增祺先生研究之后，认为这些东西很有可能是从古代西亚地区输入^[12]。这就告诉我们，“邛都夷”在战国时期就和滇、域外有双向贸易关系。《史记·大宛列传》记载：

（张）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13]

学界对“邛竹杖”尚有不同的观点。如李绍明先生认为，“邛竹杖”应是“邛人”所居地方产出的竹杖，不必拘泥于某一特定地区。张骞在大夏所见的“邛竹杖”不能确定其产地是今邛崃山（大相岭）或小凉山地区^[14]；任乃强先生认为，“邛竹杖”是由热带常绿棕榈科省藤所制。生长在我国海南岛及云南南部。自周秦之世，邛竹杖行销“西南夷”地区，又自邛国输入蜀巴，远达中原。古人以其似竹，而来自邛来，称为“邛竹杖”；但邛、蜀并无此物，随商贾漫称之为邛竹杖而已^[15]。虽然二者观点不司，但对于“邛商”

在输送贸易物品中的纽带作用则看法相近。不可否认,“邛竹杖”一定与“邛民”有关系,这种关系也可指实“邛民(商)”善于利用南丝路进行贸易活动,将“竹杖”一物远销内外。:这同邛人大石墓中所出土了来自西亚域外的绿松石珠、玛瑙珠等物现象吻合。

3. “邛都夷”对南方丝绸之路的维持、管理。《史记·西南夷列传》载:

秦时常额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⁶。

秦灭后“(诸此国)皆弃此国”当指“西南夷”都不愿和汉国家政权交往,关闭了原来通蜀郡的关隘:因而推论,原来“西夷”族群在各自的交通路线上都有设关隘,以管理维护的交通贸易。如汉武帝元狩初年遣汉使者求通“身毒道”时,“西夷”族群的表现:

天子欣然,以寡言为然,乃令寡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驰,出冉,出徙,出邛、焚,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笮,南方闭裹、昆明。^[16]

这一次通“身毒道”的失败,实由“氐、笮、昆明”等族群把控这交通路线的重要关隘,不放行汉使者所致。

“邛都夷”域在设置越嶲郡前,对于域内的交通贸易也常设险隘关口。如《华阳国志》载:

(严道县)道至险,有长岭、若栋、八渡之难,杨母阁之峻。……邛来山本名邛笮……山岩阻峻,回曲九折,乃至山上。^{t17})这里涉及到的“长岭、若栋、八渡、杨母阁”就是蜀郡通往“邛都夷”的重要关隘,在秦灭巴蜀后至设越嶲郡前实由“邛都夷”掌控管理。

(二) “邛都夷”迈入国家郡县制管理进程中的交通情况

战国至西汉前期是“邛都夷”迈入国家组织进程的重要时期,“邛都夷”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是一个“皆虽结,耕田,有邑聚”的族群,西汉武帝派军征伐南越时,并杀邛、笮君长。西汉前期“邛都夷”还有君长,反映其社会组织状态还是一个较原始的部落族群。从安宁河流域大石墓葬发掘材料来看,邛人的社会组织也远未达到国家水平。而战国至西汉前期这段时期内,“邛都夷”历经古蜀、秦、汉,直到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在“邛都”设置越嶲郡,表明“邛都夷”在外界势力的干预下跳跃式迈入先进文化。

古蜀杜宇、开明王朝时期,开明王三世保子字对南夷有大规模的征伐,“保子帝攻青衣,雄张獠、焚”。杜宇王朝古蜀国疆域为“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江、绵、潜、洛为池泽,峨眉为城郭,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华阳国志·蜀志》)其中“熊耳、灵关”就是西汉越嶲郡范围,也就是战国时期“邛都夷”的范围。而这些范围一般都认为是古蜀杜宇王朝时期的王国疆域,说明古蜀开明王朝对“邛都夷”的控制已经非常深入,也有学者通过“蜀曰邛”讨论古蜀与邛的关系,认为“邛都夷”可能就是原蜀国居民重要构成之一^[18]。

秦灭蜀后,秦对“西南夷”地区治理多有承袭古蜀经验之功。但是秦不仅仅是因袭不改,在一定程度上还将秦国成熟的郡县制度适当的向“西南夷”地区推行。如《司马相如列传》“相如曰:

⁶参考段渝先生《五尺道的开通及其相关问题》(《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认为:“开蜀故徼”释读为“关蜀故徼”,繁体字“開”乃“關”笔误。

‘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19]及《西南夷列传》“秦时常谕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20]。秦对“西南夷”地区推行国家治理是很成功的，并没有使用大规模的武力征伐，并且很好的维持了国家政权和“西南夷”之间的关系。因为政策的适宜，使得秦在“西南夷”推行国家化管理的郡县制度，也就几乎遇不到太大的阻力。

汉兴后，虽然继承了秦朝许多国家制度，但在郡县制度上反而走了一个迂回的郡国并行道路。加之国家政权一直注重关中地区，故对地处巴蜀之外“西南夷”地区情况相当陌生；甚至连秦时期在这一地区设置郡县都不太知晓，反而要询问生活在蜀地的司马相如等人。西汉武帝时期国家权力逐渐向四极扩充，实行大一统政策；加之西北匈奴之患和南方赵越之患，西汉对“西南夷”开始逐渐重视起来。这一时期，国家政权更多是以武力征伐来拓展控制势力范围，故而造成“西南夷”与西汉之间复杂而紧张的关系。西汉武帝数次征伐西南夷，大致是从起初尝试恢复秦设置之郡县，到初步设置“西南夷”边郡，再到最终建立西南七郡的初步规模。其中元鼎六年，在巴蜀外“邛都夷”设置了越嵩郡标志“邛都夷”正式被纳入到西汉国家体制内。

越嵩郡建郡之前“邛都夷”的交通贸易基本上由国家政权“浅层控制”⁷，“邛都夷”自身有一定掌控权；汉武帝设置越嵩郡之后，才渐被汉国家政权完全掌控。在汉文化强劲干预下，“邛都夷”的交通逐渐被纳入到官方用道上，或因地理阻隔或因文化隔阂，“邛都夷”的准官道交通还很不稳定，但对整个秦汉政权来说，这已是打通“西南夷”实质性的一步。这一时期“邛都夷”交通发达，四个方向上都可以辐射西南夷地区。

1. “邛都”往北通往蜀郡的交通路线，是“邛都夷”与蜀的交通要道。大致自临邛，经徙县（始阳）、严道（荣经）、杨母阁、翻越“耶来山”至阆县、台登达邛都（西昌）。这条线也是南丝路“西夷道”的一部分，到达邛都后，继续往南。沿安宁河谷地带南下经会无县、三逢县，或自会无县至大布，渡金沙江进入滇西北地区。这条路线是南丝路干线“西夷道”的一部分，以“邛都”为中心连接蜀和滇。

2. “邛都”往东的路线是一条水路、陆路相间接的路线，也是南丝路的一条支线，这条支道连接南丝路东线干道“南夷道”。从“邛都”往东经安上（昭觉）、美姑、马湖县，自马湖走水路（金沙江）抵达“僰道”，“僰道”就是东线“五尺道”的重要枢纽。“邛都”往东这条路线也是秦、汉国家政权控制最稳固的要道。如汉末“西夷道闭绝”，这条路线便成了通往越嵩郡（“邛都夷”）的要道；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南中就是走这条路线。

3. “邛都”往西是“邛都夷”与“笮”之间的重要交通要道。西向支线大致自邛都向西渡雅砻江至定笮（盐源），这条道路也是重要的一条盐道，在明代形成了著名的闰盐道。或邛都南下至会无向西渡雅砻江至大笮（攀枝花一带），进入“笮”范围。会无县古代有丰富的铜矿资源，是笮（大笮）势力范围，汉武帝设置越嵩郡后，将会无县从“笮”范围纳入新的越嵩郡（邛）范围。会无县的隶属变化，反映了国家政权在“邛都夷”推进国家化过程中，改变了“西南夷”族群间关系。

4. 西向北支线也是“邛、笮”之间的要道，西向北支线这条路线至迟在汉代就已经形成，在汉代称为“旄牛道”。“旄牛道”指从古蜀（成都）经临邛（雅安）、严道（荣经）、越邛笮山到笮都，自笮都往南经阆县、零关道、抵达邛都。或“到汉源后，过飞越岭、化林坪至沈村，渡大渡河，经磨西，至木雅草原（今康定县新都桥、塔公一带，当时是牦牛王部中心）。”^[21]在唐代自今汉源往西如人藏的古道也是

⁷ “浅层控制”见于谢维扬先生《中国早期国家》“浅层控制模式……在基本不改变当地土著固有的前国家制度的情况下，使这些地区在不同程度上处于中原王朝或国家的控制。”（书中498页），实际上在西汉“越嵩郡”建立之前，“邛都夷”与秦、汉国家政权的关系大致处于这种“浅层控制”关系，期间“邛都夷”的交通贸易自然也是受秦、汉国家政权的“浅层控制”。

川茶人藏的干道“黎州路”。牦牛王部落与笮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自木雅草原可南达定笮(盐源)。这条古道连接着古蜀、邛(临邛、邛都)和笮(笮都、定笮)。在古蜀王国时期，这条沿线重要据点“临邛”“严道”都是受蜀国控制的，在这一地区发现大量战国至汉代的古蜀青铜兵器和巴蜀印章，可以印证古蜀国对这一地区的国家化管理，加速了民族地区的国家化进程。

总之，“邛都夷”迈入国家郡县制管理的进程，是以“邛都”设置越嶲郡为其标志。设郡前的邛交通线路及功能应有承袭，如新国家政权会利用“邛都夷”自身及古蜀治理的经验，对“西夷道”沿线的维持和治理相当用心，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如司马相如在“西夷”设置一都尉十余县，为而后的越嶲郡设置做好铺垫。设置越嶲郡后，新国家政权可以利用“西夷道”对沿线的丰富资源攫取，并改变了相应族群关系。如汉政权将“会无县”从“笮”势力范围划入越嶲郡，对“会无县”的铜矿资源及“定笮”的盐资源都设法占有。

三、“临邛”对“邛都夷”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

“临邛”历来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及其丰富物产资源而成为南丝路门户和贸易枢纽。无论是古蜀王国，还是秦、汉政权，他们都非常重视这座南丝路的枢纽门户。“西南夷”能被纳入到国家政权管理中，“临邛”发挥了重要作用。《华阳国志·蜀志》记载：

临邛……从布濮水来合（火）文井江。有火井……井有二水，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斗盐。……有古石山，有石矿，大如蒜子。火合烧之，成流支铁，甚刚。……汉文帝时以铁铜（山）赐侍郎邓通。^{〔22〕}

古代临邛有丰富的盐矿、铁矿、铜资源。又：临邛县，本有邛民。秦始皇徙上郡民实之”，“本有邛民”说明在秦灭蜀之前，邛人在这一地区生活；二的：秦灭蜀后很快就控制了临邛，张仪在临邛很快就筑造城池。

《华阳国志·蜀志》载：

临邛城，周回六里，高五丈。造作下仓，上皆有垦。而（笔者按，任乃强先生改为：门）置观楼射闾。^{〔23〕}

秦国家政权如此重视“临邛”，除了交通位置的重要性外，其丰富的矿藏资源更是国家政权看重的。

“临邛”的地理位置上也很重要。“临邛”任一：逢先生解释为“临近邛笮山”^{〔24〕}，邛笮山就是今：相岭(又称泥巴山)。“临邛”以北是成都平原；临邛正好处在成都平原与川西山地的地理分界线上。“临邛”西南是“笮”活动区域；以南临近“邛都夷”；北就是古蜀、秦汉蜀郡。《华阳国志·蜀志》记载“临邛县，本有邛民”，古代临邛县，大致包括今蒲江、邛崃、大邑等地〔25〕。秦灭巴蜀之前的“临邛”曾是邛人活动的北界。“邛都夷”“笮都夷”与蜀郡三者在“临邛”交汇，形成一个古代西南地区贸易枢纽。

“临邛”在秦灭蜀之前和“邛都夷”的关系极密切，随后被秦汉设置的蜀郡纳入，“临邛”和“邛都夷”的联系也一直不断，“临邛”作为“邛都夷”北部的重要交通出口，连接着“邛都夷”与蜀之间的贸易交流。古蜀与秦、汉政权对“邛都夷”的“流风”政治活动具体如何，可以从“临邛”地位变化中窥见一二。

安宁河流域大石墓葬反映了古代“邛都夷”生活状况，其早期出土器物中包含了北方草原青铜文化、川西青铜文化、滇西和滇文化等文化因素。但却极少见到有巴蜀文化因素，这是一种奇异的文化现象。反映出这一时期“邛都夷”与古蜀文化之间的交流少，这种现象，应当是蜀与邛之间竞争关系所致。《华阳国志·蜀志》：“保子帝攻青衣，雄张獠、僰”，保子帝是开明三世，青衣指的是今青衣江流域的芦山县、宝兴县、泸定县、金川县^[26]。可见保子帝时蜀有一股强势南下的军事活动；“临邛”很有可能就是在开明王朝时期就已经被蜀占据，邛也极有可能就是在开明王朝时期就南退，不在邛笮山以北活动了。

如《华阳国志·佚文》：

邛笮山，邛人、笮人界也，邛人自蜀入，度此山，道甚险，南人毒之曰“邛来”。^[27]

邛人由邛笮山以北退至以南，与开明时期蜀向南有强行的军事活动有关。邛人退入“邛笮山”以南后，与蜀的交流就少了。一方面蜀占据了“临邛”，掌握了原来邛人的盐、铁、铜等资源；另一方面蜀人把“邛都夷”人逼离到“邛笮山”以南，蜀、邛相仇，交流自然稀疏。

秦灭蜀后，张仪筑“临邛”城，秦、汉国家政权历来重视“临邛”重要地位。如秦灭蜀后，希翼自南向东对楚实行战略包抄，而打通“西南夷”必须先要重视“临邛”。汉替秦后，汉王朝也极力在“西南夷”地区开疆辟土，自蜀南下“西南夷”地区必经“临邛”。秦汉时期安宁河流域考古出土发现越来越多的中原文化因素，如大石墓拉克四合 M8 出土铁指环、“四铢半两”钱和印章等，据学者研究将这一时期断为西汉末^[28]。秦汉国家政权在西南夷地区反复经营，“西南夷”与国家政权之间的联系越加密切，使南丝路的战略地位越来越重要，作为南丝路的重要门户“临邛”其地位自不待言。

结论

中国早期国家进程中，“西南夷”一直都是处在边缘位置，其自身走向文明社会的道路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原或邻近地区先进文化的影响。秦、汉国家政权在“西南夷”地区推行边郡制度是早期国家化向外扩充的重要表现，见诸“西南夷”地区，“南方丝绸之路”在这一历史阶段中有着重要纽带作用。战国至西汉前期“西南夷”渐被纳入先进国家组织，这一历史进程中“邛都夷”如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在不同阶段与新国家政权的关系起伏不定，这种反复变化的边区关系可用司马相如“政教未加、流风犹微”来概括之。“邛都夷”在“西南夷”区位非常重要，且在南方丝绸之路的交通布局中地位特殊，使得“邛都夷”迈入先进文化的进程中特点明晰。如“邛都夷”因在战国至秦汉时期对南丝路的维持、治理的经验，使得“邛都夷”与先进文化的接触中占得先机。并且“邛都夷”交通是在整个“南丝路”交通体系下形成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上辐射交通网，如此更能很好替先进文化联络“西夷”“南夷”地区。相应地“邛都夷”在“西南夷”转向郡县体系的国家管理进程中，成为了重要的前方基地，其政治和经济地位愈加显著。

参考文献

- (1) (3) 段渝. 西南酋邦与中国早期文明[M]. 商务印书馆, 2015. 7, 199.
- (2) 谢维扬. 中国早期国家[M].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5. 507-509.
- (4) 段渝, 刘弘. 论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化的关系[J]. 学术探索. 2011, (4).
- (5) 段渝. 论商代长江上游川西平原青铜文化与华北和世界文明的关系[J]. 东南文化. 1993, (2).

-
- (6) (19) 司马迁. 史记. 司马相如列传[M]. 中华书局, 2014. 3697, 3692.
- (7) 霍魏. “西南夷”与南方丝绸之路[J]. 中华文化论坛. 2008, (2).
- (8) (9) (11) (15) (22) (23) (24) (26) 任乃强.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198, 157, 199, 327, 157, 128, 160, 124.
- (10) (17) (25) (27) 刘琳校注. 华阳国志校注[M]. 巴蜀书社, 1984. 965, 965, 245, 965.
- (12) 张增祺. 西南夷地区“大石墓”及其族属问题[J]. 考古. 1987, (3).
- (13) (16) 司马迁. 史记. 大宛列传[M]. 中华书局, 2014. 3843’ 3844.
- (14) 李绍明. 说邛与邛竹杖[J]. 四川文物. 2002, (1).
- (18) 石硕. 古蜀国的邛人及其相关问题探讨[J]. 中华文化论坛. 2009. 12.
- (20) 司马迁. 史记. 西南夷列传[M]. 中华书局, 2014. 3697.
- (21) 任新建. “茶马古道”与松潘[A]. 四川省社科院民族宗教研究所, 松潘县政府编. 松潘历史文化研究文集[C].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4. 185.
- (28) 左志强. 安宁河流域大石墓遗存分期研究刍议[A]. 安宁河流域古文化调查与研究[C]. 科学出版社, 2012. 403.